

是本文檢討的對象限於中國的私德和公德的問題，所以我們在這裏只把國內的公德實踐提出討論一下。根據這種立場，在公德上負着最大的責任的，首先就要數到政府機關的主持人，他們對於主持的機關負有領導的責任，所以那些機關的設施是否能謀公衆的福利，也就由他們負起主要的責任。如果他們非但不能力謀公衆的福利，反而假公濟私，仗勢橫行，那麼他們損害公衆，貽禍公衆的可能性既然極大，他們敗壞公德的可能性自然也是極大的。從此類推出去，一切公共機關和公共團體的主持人，也對主持的機關或團體以及一般公衆負有最大的公德責任。其次一切在公共機關或公共團體任事的人員，他們自然都對任事的機關或團體以及一般公衆負有極大的公德責任。他們必須爲機關、爲團體、爲公衆而效忠，否則就是有虧職守，有背公德。又次，在地方上負有聲望，佔有勢力的士紳和大戶等等，他們的一舉一動也對地方公衆的福利大有關係，所以他們也對地方公衆負有極大的公德責任，必須盡力爲地方造福，否則也是有虧公德。但是無庸諱言，抗戰以來，中國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雖然臨到危急存亡的關頭，而國內竟有許多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奸商梟販，假公濟私，混水摸魚，大發其國難財；他們的敗壞公德簡直不是筆墨所能形容。因此，我們爲着抗建大業的前途着想，也大有提倡與發揚公德的迫切需要。更次，獨立營業的醫師、律師、會計師以至投機商人等等，他們對於公衆也有極大的利害關係，所以他們也都負

有極大的公德責任；如果他們專以謀利爲目的，把公衆的福利置之度外，那麼他們也大可貽害公衆，敗壞公德。尤其是在戰時的上海，投機商人貽禍公衆的行爲簡直罄竹難書，他們的敗壞公德也是達到極點的。

我們要想提倡與發揚這種公德，單用口頭和筆頭去作空洞的宣傳當然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要把當前國內政治、經濟的情狀，根據改善公共關係的立場，加以明確的評估。我們知道三民主義是我們當前抗建大業的最高原則；我們必須隨時隨地盡力推進三民主義的實施，提高民權，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促進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和社會的實現。惟有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和社會真正建設起來，一切敗壞公德的行爲才會受到民主的控制和防止。但是敗壞公德的行爲，不僅一切從事或能操縱有關公衆利害的公務或業務的人們容易去犯，除此以外的一切人們也都容易去犯。不論是誰，假如他糟蹋公物，濫用公帑，或者隨處吐痰，隨處拋棄果皮穢物，或者在公共場所搶先推人，在船上搶佔幾人的位置，或者把藥渣倒在街心，把「出賣重傷風，一見就成功」的紙條貼在通衢……那麼他就是有害公衆，大背公德了。這種公德的提倡和發揚是跟上面所說的那一種不能一例看待的，我們必須先從本身做起，然後逢人宣揚，遇事鼓吹，這樣，便可使得公德的水準在社會上逐步提高起來。

中國今日非南宋明末論

姜季辛

——駁斥日人會我部「宋明之滅亡與國民黨政權」之謬論——

一 日人對華之認識不足

「認識不足」一語，原是八九年前日人爲攻擊「李頓調查團」及反對國聯對「東三省問題」時所用的攻擊之詞，但其實，「認識不足」這

四個字，倒可確切形容天資低人一等的日本人對於宇宙間萬事萬物理解的程度。就讀書識字說吧，從公元三世紀起，中國人和朝鮮人便苦心教導日本，本人攻讀中國詩書，但日人始終是一知半解，不能完全領悟。例如漢書、霍光傳中「諸事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之「關白」二字，日人竟當作官名，

因而仿稱像霍光一樣大權獨攬的宰相爲「關白」或「關白大將軍」這「關白」的官名，從我公元八八八年起，一直沿用到明治維新時纔廢，若非「認識不足」曷克至此？

結果日本人愈研究中國而對中國愈認識不足。在明治維新以前的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全國上下皆尊崇儒學，敬畏中國文人學者都以改用中國式的外號爲榮（如林「羅山」，菅「玄同」，堀「杏庵」，貝原「益軒」）通都大邑，都以盜用中國的地名爲美（如稱江戶爲武昌，京都爲洛陽，廣島爲廣陵，又如信州、房州、長州……等，則是仿中國地名而命名者）這可以說是日本研究中國最努力，崇拜中國最誠篤的時代。中日甲午戰後，日人對華的觀念，由「崇敬」一變而爲「輕蔑」，這種「輕蔑中國」的成見，雖在國民革命的熱潮濺蕩了全中國以後的今日，卻未嘗稍減。所以現在一般日本人的心目中，以爲中國的男子，還都是身穿坎肩，背垂長辮，以爲中國的女子，還是三寸金蓮，不能舉步。而且他們以爲現今的中國軍隊，還是和前清的綠營兵一樣不堪一擊，所以在學校裏或公共場所，對於行動特別遲鈍的份子，往往罵之爲「支那兵」，對於一般中國人，且常罵爲「清國奴」，其對華的認識，完全和三四十年前沒有兩樣！

九一八以後，我中央於外患內憂交迫中克服種種難關，完成國家的統一，並展開建設新國家的工作，獲有顯著的成績，使日本各界較有見地的人們，感於新中國之不可侮，於是發出對華「再認識」的呼聲，力言中國的統一，是歷史演進的必然趨勢，是民族主義的潛在力量發揮的結果，決非任何外力所能阻撓或破壞，希望一般的日本人改變對華觀念，放棄一貫的破壞中國統一的妄想，並基於平等的原則，利用溫和的手段而與中國「調整邦交」。除一般較有知識的資本家與人民戰線份子乃至共產黨人外，如外交官有吉明、佐藤尚武，乃至文化人太田宇之助、神田正雄、室伏高信之流，都會經高唱過這一類的論調。（但室伏等少數人，於七七以後，竟改變其論調，可見彼等對華仍是認識不足）

但是，一般對華素有偏見，錯覺無從矯正，日吏日閥們，卻堅認中國的統一，只是虛有其表，在實際上，中國人還是勾心鬩角，互不相讓，日本大可施

以「先分化而後各個擊破」的策略，以漸進的方式而征服全中國。基於這種觀念，所以纔有蘆溝橋之役的演成，而八一三之猛犯我滬濱，及此後之進侵我首都，更是日閥對華「認識不足」所致。當時日閥以爲「三個月可以攻陷我首都，首都既失，則我國府崩潰，全中國自當四分五裂而任日本自由扶植「親日政權」於各地，如此便可實現其征服全中國的夢想」可是這種「認識不足」竟使日本侵華陷於泥沼五年以來，雖日呼迅速解決「中國事變」而泥足日益深陷，無法跳出「欲罷不能」「啼笑皆非」的苦海。

二 會我部的謬論

在此次中日開戰經過年餘，廣州武漢相繼淪陷以後，日人鑒於我方抗戰實力未嘗稍減，抗戰必勝的信念，絕未動搖，不免憂從中來，大感失望。於是若干一知半解的日本文人學者，基於一貫的「對華認識不足」的病根，便穿鑿附會，濫引典故，妄以今日領導我全國軍民抗戰不屈的國民政府，比附臨安失陷後的南宋和滿清入據燕京後的明室。這種以曲解歷史爲手段的「宣傳戰術」，雖對我具有必勝信念的中國軍民毫無影響，然對一般日本臣民的心理上，卻可發生若干刺激或興奮的作用！

民國二十七年冬季，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東洋史副教授會我部靜雄在日本外交時報上發表一篇「宋明之滅亡與國民黨政權」的謬論，濫引許多史事，苦心謀證今日之中國，正與南宋明末走着同一路線；這篇文章，在該國同類的謬論中，似可稱爲「代表作」，不但會引起了敵方人民的重視，而我國研究敵情的人們，也都加以注意。

會我部文中的要論據，大體如左：

（甲）中國四千年歷史（中國歷史何止四千年）中，經過多次換朝易姓，然遭外族滅亡之朝代，其聲華大者則爲宋與明；此次中日戰爭，國民政府與異族之日本抗衡……行將爲異族所滅，與宋明之亡於異族者相同……見滅於異族之宋明，其最後的景象，比諸被同族所覆滅之朝代，顯有不同前者苟猶存王族一人，尙有寸士尺地，則必繼續抵抗，企圖恢復；後者則以天子之退廢國都之失陷而決定舊朝代的滅亡。

(乙)中國士大夫之忠節表現：在與同族鬪爭時多帶消極性，往往因不願改事新朝而退隱深山以全其節，惟對異族鬪爭時，則於忠節觀念之上加以種族意識，故其表現轉趨積極，恆不樂於退隱，卻欣然誓死抗戰。國民黨素以「排日」「侮日」「抗日」爲主要國策，對不願附和者則指爲國賊……黨人堅決抗戰的原因，除擁護國民黨政權外，尙雜有民族觀念，言宋明滅亡之往事，今日可以重演，而事實上正已踏進了同樣的路程。故都北平，孫總理陵墓所在的南京，革命策源地的廣州，與「最後國都」的武漢，先後淪陷，而彼等依然抵抗，今後且將繼續抵抗不已。國民黨員之忠於黨者，雖至最後一人，亦將繼續抵抗……國民黨一日存在於中國，中日戰爭將無了局。若將國民黨員從中國人中完全排除之，則此「聖戰」之目的纔能達到。

(丙)宋明末期，均汲汲於乞求外援（例如宋末陳宜中、張世傑先後赴占城，明永歷帝之幸緬甸，並命龐天壽等致書羅馬教宗乞援，鄭成功黃宗羲亦議向日本德川幕府求助），今日國民政府則仰助於美蘇英法諸國。中國至危亡之際，向外國低首求救，已將自己之「優越感」拋棄無遺矣。

考會我部之謬論的來源，一方面固爲他本人讀中國古籍的理解不夠，而另一方面則似乎受了現代日本統治階級一貫的對華「認識不足」的影響，或教唆日本的統治階級——日吏日閥們，常以現代的中華民國爲宋季明末，逃不了歷史上亡國的覆轍（見總裁言論「抵禦外侮復興民族」第三講），所以除教唆若干文人學者，曲意宣傳中國之弱點外，並致力於研究遼金元清侵犯中原的策略。會我部靜雄雖是帝大四五流以下的教授，而他苦心學習了多年中國史和蒙古文，自然也可充數於御用學者之列，那末他這篇謬論之作，縱非日閥所授意，至少也爲了迎合日閥的心理，因此我們可以視之爲「日統階級妄以現代中國比宋季明末」的「餘音」或「註脚」。

三 中國今日並非宋季明末卻如漢唐開國

東方雜誌 第三十八卷 第二十號 中國今日非南宋明末論

(甲)宋明致亡的主因及當時的亡國現象

日本統治階級，被一貫的對華的錯覺所支配，不但了解「中國現代史的背景（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對於現代中國的需要）和中國國民黨完成統一大業後的中國，業已踏進了漢唐開國的途程」，反而常妄言今日的中國將踏宋季明末的覆轍，難免亡國之禍。茲將先舉宋明覆亡的原因與現象，以證其荒誕無稽。考宋明「致亡的總因」不外「君主昏庸，是非莫辨，權奸亂政，肥己誤國」而基於這種「主因」，便暴露出後述幾種最顯著的「亡國現象」：

(一)乏戡難禦寇之大略

北宋嘗以「主和罷戰」及「恃和忘戰」而敗覆，南渡而後，理應改弦更張，以圖報雪。況高宗初年，尙有李綱、趙鼎、張浚、宗澤、韓世忠、劉錡、岳飛、張俊等賢豪，分任將相，正是「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大可恢復中原而直搗黃龍的「中興局面」。然而高宗昏庸，竟先後被黃潛善、汪伯彥、秦檜等巨奸大逆的「和平謬論」所惑，一意「避戰主和」，不惜屈膝稱臣，以致李綱、趙鼎、張浚先後貶斥，宗澤憤死，岳飛被害，及韓世忠、劉錡卒，國中更少禦虜之人，劣敗的局勢，終於無法挽救。

宋高宗及汪黃秦檜等昏君奸臣，誤國共三十餘年，恆聚天下玉帛以賂金，殺抗戰將帥以媚金，宋代元氣，殆已喪盡。孝宗立後，雖以復興爲謀，並一度倚重張浚而發動抗戰，然亦以「偷懦」和「苟安」的心理作祟，初開勝而驕，繼開敗而餒，終則依奸官湯思退等主和的下策，罷張浚，拒「十賀」而就「十弔」，再拜奉書於「叔大金皇帝」，如朱子所痛論「君子有未用，小人未去，大臣失其職，小人竊其柄……責人或已詳，反躬有未至……」云云，以英明見稱，以中興自任如孝宗者，尙且如是，則聰明才智不如孝宗者，其昏庸誤國，更不知伊於胡底。所以孝宗以後，歷光宗、寧宗、理宗、度宗諸帝，先後有韓侂胄、史彌遠、史嵩之、丁大全、賈似道等巨奸擅權，皆以和戰爲兒戲，或「主和罷戰」，「恃和忘戰」，或則「不備戰而挑戰」，而趙宋三百二十年的社稷，便終爲賈似道的「陰和陽戰」及「非和非戰」的作風所斷送。迨元軍陷建康（金陵）而迫臨安（杭州），奸相陳宜中既拒文天祥請置四鎮之

議，又阻天祥等背城一戰，一意主降，遂使母后、幼主蒙牽羊繫頸之辱；而他自已則乘機潛逃，以求個人之安全。

至於臨安失陷後的宋室，大權依然操於「嘗使母后、幼主坐以待擄」的陳宜中，其奸險誤國實與賈似道無異。宋端入閩之初，文天祥議入溫州以圖進取，宜中力阻不許，遂使宋室永無規復的機會。而且，因有奸相陳宜中之擅權亂政，倒行逆施，雖經文天祥、張世傑等忠勇苦戰，殺身成仁，亦不能挽救宋室的危亡。

明代衰亡之跡外表雖與宋或有不同，但內幕實無以異，而熹宗之昏庸無道，較南宋諸庸主尤有甚焉。至魏闕之殘害良忠，亦甚於自汪黃秦檜以下的南宋一般奸逆。迨思宗繼立，雖懷中興大志，力謀挽救危局，但其秉性偏刻，於忠奸真偽之辨不能得其正，於施為次第之間不能得其要，致仍不免「君子有未用，小人有未去」，例如彼雖誅魏闕、客媼，卻仍寵任許多宦侍，甚至「監軍各鎮」與「拱衛京師」的重任，亦莫不付之宦侍。思宗所寵任的權臣，首推周延儒與溫體仁。延儒「實庸鷲無材略且性貪，當時邊境喪師，李自成殘掠河南，張獻忠破楚蜀，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畫」同樣的「體仁輔政數年……流寇躡畿輔擾中原，邊警雜沓，民生日困，未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為仇」（例如袁崇煥即為溫體仁所害）。當寇深亂亟之際，居中樞負調度軍事之重任的兵部尚書如楊嗣昌、陳新甲之流，又皆庸懦無能，拙於謀國，「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以致着着演成「後局」，處處造成「危形」。思宗因為偏寵宵小、佞臣，所以許多賢臣、勇將，或被罷斥，或遭刑戮，無從展其長才。而當時內憂外患交迫，大局之危險，且有甚於宋季，故思宗雖抱中興大志，一如南宋之孝宗，而結局卻不能如宋孝宗之能偷安而終。

明末嘗竭全國之兵與餉，以備邊患，而一般庸鷲偏私的中樞大臣與宦豎，竟對前方之用兵作戰，橫加干涉，對於卻敵有功的將帥，輒加傾害，致隨熊廷弼、袁崇煥之冤死，守邊無人，便決定了明代滅亡的命運。熊廷弼嘗奏言：「……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閔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開言責戰矣。自有

遼亂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台諫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心意，一不從輒愀然怒哉！袁崇煥亦嘗奏稱：「……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即不能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當時廷臣之昏瞶糊塗，罔識大體，一至於此，讀熊、袁之慷慨陳詞，能不為之痛惜？」

明思宗時，邊患益亟，數年之間，清人幾度入塞，竄擾近畿。當時，朝廷雖亦忙於調兵籌餉，但無禦虜卻敵之策，尤乏抗戰的決心，而清人第三次入塞時，思宗且為楊嗣昌「高起潛之一和平謬論」所惑，不增兵益餉以支持孫承宗、盧象昇等之英勇抗戰，使孫盧兵單械盡，均壯烈殉國。其後陳新甲任兵部尚書，亦朝進一策以謀和，暮獻一計以謀和，思宗竟納其議，且許其遣派專使（馬紹愉等）赴瀋陽作割地請和的談判。議和的條款，雖後因阻於衆議而未及履行，但思宗與兵部尚書等重要軍事當局之一意「求和避戰」，卻為極顯然的事實。又當流賊之初起，原不難一鼓蕩平，亦以朝廷無恤民戡難的良策，致令楊鶴、陳奇瑜、熊文燦等先後濫加招撫，聚糧糗以資寇，終使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及賊勢猖獗難制，余應桂請會師真保，吳麟徵請徙師入衛，范景文請遷國南都，而思宗皆不之許，竟坐待賊衆之進逼京師。

其後，福王即位於南都，「因感奸相馬士英擁立之功，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為人貪鄙無遠略，復引用奸逆（阮大鍼等）」日事報復，招權罔利，以迄於亡。故九江僉事王思任嘗痛斥之曰：「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已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邱墟，閣下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亦可以自解……莫若明水一盃，自剝以謝天下……」（見「明季南略」卷十五，王思任上馬士英書）。福王初立，明局原無異於宋室之南渡，然福王立僅年餘，即被擄致死，南明國祚之短促，以視南宋，相若無乃太遠，可見福王之昏庸，實遠甚於宋高宗，而馬士英、阮國之罪惡，亦過於黃汪和秦檜。

（2）味同舟共濟之大義彼此交惡
宋季明末，均係權奸攬政，日以貪黷自私，誅黜賢良為事，廷內固不許能

臣立足，疆場亦不容良將領兵。而當時禦寇討賊的一般文臣武吏，且亦多味同舟共濟的大義，或則互相傾軋，或則觀望不前，卒使強敵流賊得逞，其各個擊破的狡計，此亦宋季明末所共見的亡國現象。

宋末臨安未陷之前，前方將領已迭有人叛國降敵。但理宗景定中，元將李璫卻舉三齊反正，其所部兵強馬壯，以任先鋒而收復失地，大可振奮人心。號召忠義，使南宋得有進復中原的良機；而蒙軍大舉攻璫時，宋將青陽夢炎奉命赴援，竟觀望不前，坐視璫被圍敗死，致讀史者嘗論「李璫死而北人絕歸朝之志」。宋孝宗會一度勇於對金人抗戰，迭獲勝利，只以符離之敗，遂又屈膝求和，但符離之會戰，實由宋將邵宏淵不肯與李顯忠協力作戰而致敗；又蒙古軍圍襄樊數年，宋將范文虎以水陸之衆十萬赴援，竟不肯力戰解圍；及李廷芝奉命節制各路援軍，文虎公然又請賈似道特許不受李節制，且在敵前恆與李爲難，使李亦無功。其後樊城陷而襄陽益危，羣臣公薦高達赴援，但賈似道竟忌達成功而不遣，而襄陽守將呂文煥亦不悅達往，公然「妄奏大捷」以阻達。然而，奏捷未久，呂氏卻以「勢窮援絕」叛而降敵，襄樊屏障江淮，南宋之偏安，實多賴其掩護，而沿江州吏，當時且多呂氏舊部，及呂引敵東下，各州遂望風附敵，使鄂、贛、皖均不守。可見宋將不能同心協力以守襄樊，更是南宋的致命傷。其後蕪湖江上之役，乃臨安失陷前宋元間的最後一戰，而是役宋軍之不戰而潰，亦係將帥不能同心協力，互相觀望所致。至於高宗時，老將張俊因忌岳飛「功出己上」，不惜助秦檜構成冤獄而殺害岳飛，則更是「國人所痛，敵人所快」的一幕。

明末諸將之彼此交惡，互相水火，較宋季殆有過而無不及。論備邊患，則經（略）撫（巡）不能同心協力（例如熊廷弼、王化貞之不和）之外，而中樞大臣且常牽制前敵將帥（例如葉向高等與熊廷弼爲難，楊嗣昌與盧象昇等爲難），使無從展其長才。至於討賊諸將，於勦撫異策（例如左良玉、洪承疇、余應桂等窮追殘寇，而熊文燦等則以招撫而救殘寇）之外，又有攻守殊途之失（例如楊嗣昌與左良玉、賀人龍之步調不能一致，賀人龍、虎大威、李國奇之棄傅宗龍、楊文岳而先遁，白廣恩與高傑、楊茂選與覃思偈之不能協力作戰）又如清人入關之初，流賊回竄陝川，自淮漢而南，國士尙甚完

整，各省督撫總兵，苟能協力同心，共赴國難，大局豈無挽回之可能？惟當時事實，卻與此相反。福王定住南都後，因馬士英擅政而將士離心，左良玉且公然叛變，劉良佐終亦舉兵降清，甚至忠烈殉國的史可法節制下的江北四鎮將領，亦彼此交惡，勢如水火，而高傑死後，史公奏請優卹時，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三人，猶銜恨合奏傑「從無寸功，驕橫淫殺……史可法乃欲其子承襲……不知是何肺腑，倘誤聽加恩太重，臣等實不能相安矣！」其仇視高傑，至於此極。

福王被虜後，唐王、魯王各受一部分文武吏的擁戴，致閩浙對立，勢如水火。當時萬元吉守贛南，屢挫強敵，大振國威，惜以粵桂滇閩各方援軍之不能協力作戰，終至覆敗。其後桂王立於西南，亦首有宗室閩牆之爭（廣東曾另立紹武），而幾經播遷之餘，文武內外諸臣，亦多汲汲於權位利祿之爭，使國勢日蹙，其能如瞿式箱、焦璉、何騰蛟、李成棟、李國定等之奮關至死，絕不計及私人利害者，殊不多見！

(3) 賞罰濫而豪傑灰心，聚斂甚而民生凋敝
宋季明末，除右述兩種最顯著的亡國現象而外，賞罰進退之不得其當，以致「英雄解體，豪傑灰心」，亦爲重要的亡國現象。例如宋末劉整因被誣畏如向士璧等之冤死，遂舉兵降蒙古。致宋臣多起賣國求榮之念，范文虎坐失襄樊，當斬。賈似道竟「以賞代罰」，使知安慶府致宋將多存避戰貪生之心。明末楊嗣昌、滕蔽思宗，專門援引戚里親故，極力壓迫良將勇士，以致寇深亂亟，無可救藥。又馬士英輔立福王，一意忌功害能（壓迫史可法等忠勇愛國的人物），濫進奸邪（援引奸逆阮大鍼等），且激起左良玉之變。至於宋賈似道之推行「官田官莊，經界推排法」之虐政，明思宗之「講求聚斂之術，不問水旱災傷」（明劉宗周之奏言），以致「黎庶顛連，閭閻凋敝」（明思宗罪己詔中語），亦未嘗不是促宋明於滅亡的現象。然而探討本源，卻無一不是庸主誤國，奸官亂政所造成的結果。故推究兩朝覆亡的根本原因，終不外「庸主誤國，權奸亂政」而已。

(乙) 中國今日絕無宋明亡國的因素
宋季明末致敗的主因及其種種亡國現象，已如前述；反觀我國今日，所

有一切現象，無不與之絕對相反。蓋自北伐成功以來，執政者乃是代表國民大眾的利益，為民族解放而鬪爭的中國國民黨；代表國民黨而執行行政務者，乃黨的幹部，莫不富有超人的才識和革命的精神與歷史。因此我國今日絕無類似宋季明末「庸王誤國，權奸亂政」的「亡國總因」！又如宋明於「無經國的大計」對外敵無抵抗的決心，對內政無改善的覺悟。我國今日，則以救國的三民主義及國民黨的各種政綱與決策，努力於新中國的建設；而對日抗戰，正如往昔德意志之為達其建國的目的，必須於普奧戰後再繼之對法一戰，尤為當局多年來所堅執不移的國策，此等事實，決非宋季明末之遇事皆無一定之方策者所能比擬。

至於今日在英明偉大的領袖領導之下，全國精誠團結，共同奮鬥，尤為前所未有。所以抗戰五年來，國軍紀律森嚴，步武絕對一致，不但抗戰將領中絕無類似劉整、呂文煥以及洪承疇、吳三桂降敵的事實，而曾經降敵附賊的匪徒，且紛紛反正，立功自效。這種「人人咸抱必死之決心」的現象，更足以證明今日的中國，決不能與宋季明末相提並論。

(丙)中國今日正如漢唐之開國

近百年來，我國因遭列強環攻，國步之艱難，超過歷史上任何時代。中國國民黨於此杌隉的局勢下，奮起革命，以建國復興為己任，其使命之艱鉅，雖承戰國及秦亂之後起，而安邦定國的漢代承五胡亂華及長期分裂割據之餘起，而一統中原的唐朝，亦有所不及。例如十餘年來，國民革命所消滅的國內的敵人，不僅在國內植有悠久鞏固的勢力，而在國際間亦各有其與援，恆特以阻遏國民革命的進展。至於對外關係而言，今日中國遭逢的外患，其最顯著而凶狠者，首推六十年來未嘗片刻中止其侵華之陰謀——於武力進攻之外，且迭以「排撥分化」、「偽裝親善」等政治進攻的手段而謀我的日本帝國主義，其殘暴毒辣，殆甚於漢初之匈奴、唐初之高麗，突厥千百倍。往昔匈奴、突厥等之入寇，其目的只在俘掠，今日日本侵我，則欲吞併我土地，消滅我民族，兩者的居心和作風，都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國民黨統一中國甫近十載，於對內展布建國宏圖之餘，於民國二十六年之夏，且能領導全國軍民，對外與強敵展開長期抗戰，此實黨的主義

適合民族的要求，黨的政綱，能代表全民的利益，與黨的領袖勵精圖治的偉大精神之感召所致。以三民主義的精深博大，國民黨各種政略之切合時宜，加以黨的領袖之英明偉大，比之漢唐開國的規模，實有過而無不及。

總之依我國數千年來治亂相循之歷史演變的準則以及晚近國人圖強望治，粉碎敵人離間分化之陰謀，竭誠擁護國家統一的決心而言，中國今日原已踏入由亂而治的階段。況有救國的三民主義指示國人以努力的途徑，復有賢明的領袖，領導國人堅苦奮鬥，是我革命建國的成功，更已獲得充分的保證。

四 就中日歷史論如次抗戰之前途

宋季明末之「罷戰」、「忘戰」與夫「避戰」而「不備戰」原是重要的亡國現象。事實上南宋之能偏安一百五十年，並非由於「和議成功」與「稱臣稱娃」實賴岳飛、韓世忠等名將之屢破金人，虞允文之采石磯大捷以奠其基礎，而宋孝宗之能「改臣稱娃」也還是由於張浚曾以李顯忠、邵宏淵等力戰卻敵，致金不敢輕視宋之實力。至於南明四主，魯王因先後依張名振、張煌言及鄭成功而抗戰，故支持較久，永曆帝以瞿式耜、何騰蛟、李成棟而抗戰，雖疲於播遷，亦嘗大振軍威，其事跡均較福王在南京不講戰守之策而自速其亡者光榮多多。此外明末江南義軍四起，各州郡守吏紛紛起兵拒敵，亦嘗屢挫敵鋒，造成許多悲壯而光榮的戰績。又遠如六朝之能偏安江左，亦全賴其以戰為守，不放棄「進攻江淮以北，力謀規復中原」的雄圖。可見苟能奮勇力戰，即可禦侮圖存，惟有避戰苟安，始招滅亡之禍。此等歷史上之教訓，實瞭如指掌。今日我國依全國上下的要求而決定與暴日作殊死戰，正是「力戰圖存」之道，根據歷史之教訓，可斷言吾人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日本現統治階級嘗苦心研究遼金元侵犯中原之策術，且依元清會統一中國的事實，遂起併吞中國的野心。其實，以日本人的低能、偏狹、殘暴、毒辣，決無征服文化之傳統悠久，文化意識發達的中華民族之可能。日本人近五六十年來所執行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不光明的「下流勾當」。其往昔之謀朝鮮，近今之侵我國，都是以浪人娼妓為前鋒，以勾結匪類為上策，所以一

直到今天爲止，日本所收買的漢奸，都是爲人類社會所不容的敗類，無一身家清白之人（例如汪兆銘，乃是我國最無政治道德）況中國今日民氣——民族意識之盛，更非宋季明末所可及，凡屬身心健全的正面君子，誰肯認賊作父，賣國求榮？故今日縱有忽必烈、皇太極、多爾袞再生，也難得豫劉秉忠、許衡、姚樞、張弘範、劉整洪、承疇，乃至吳三桂等一羣富有聰明才力的國賊做配角。

明萬曆中，日酋平秀吉侵朝鮮，欲犯大明，其雄心壯膽，一如今日之日閩。但秀吉侵朝鮮七載，勞師百萬，卒爲優勢的天兵（時日軍稱明朝爲天朝，稱天朝之將士爲天將天兵）所阻，並爲朝鮮軍民堅壁清野及發動游擊戰所困，以致進退兩難，一如日軍今日侵華之深陷泥沼而一籌莫展。最後，秀吉且因此憂憤死，而臨死猶言：「我不幸生於小國，兵不足，奈何，奈何！」表示無限的懺悔與遺憾，如就往昔的歷史而推測此次中日戰爭的前途，則秀吉的遺言，正是今日日閩侵華必至慘敗的讖語。

五 曾我部教授之淺薄

曾我部以攻究歷史爲生活之人而談歷史，竟不依客觀的態度，以說明此次暴日大舉侵華的原因與結果，而一意妄論我國抗戰之前途，將與宋端宗、衛王、明永歷帝同樣結局，其偏狹與淺薄，實無以復加。

曾我部文中謂中國歷來同族鬪爭時，一旦都陷君退，即隨之換朝易姓，惟於外族入侵時，國人基於種族觀念，始奮起抵抗，此亦似是而非之說，與史實絕對不符。夏帝相被弑後，少康且曾中興，秦滅六國，六國遺民亦終亡秦，王

莽曾不篡漢，更有光武昭烈之光復與討賊，而數千年來類此之事實極多，可見中國士大夫對同族之爭王位，其忠節之表現，並不消極。其實中國人素有「是非之心」，重視「順逆之辨」，故在順應國民大衆之要求而換朝易姓之際（打倒暴君）死君殉節者極少。反之，在強藩權臣逞威奪篡之際，國人必勇於靖亂勤王，其以誓死力戰而表現忠節，決不亞於抵禦外侮。至於此次對日之全面抗戰，實由於全中國民衆爲求生存存與自由而展開的偉大鬪爭，抗戰的領導者，固爲中國國民黨，但抗戰之目的，並非爲維持黨的地位。曾我部竟妄謂抗戰只爲維持國民黨的政權，堅決抗戰者只限於國民黨員，彼以治中國史爲專業之人，竟不明瞭中國近代史的背景及中國之現狀，其淺陋無識，真可笑亦復可憐。

曾我部文中且以今日各國之援華，比附宋末陳宜中之赴占城乞援及明末永歷帝鄭成功等之向外求助，此更不倫不類，乃毫無國際政治之基本常識的謬說。近代國際間之赴援或互助，無一不是由於共同的利害，苟非暴日肆行侵略，損及列強在東亞之利益，威脅各國之安全，我縱相求，各國亦不至公然助我而招致日本之仇視。明末固嘗有通好於羅馬宗教之信使，鄭成功亦或有向日本募兵購械之事實，然羅馬日本當時對於明室之存亡，根本無關痛癢，故所謂「求援」云云，均無具體的結果。至於宋末陳宜中之赴占城，乃宜中背棄君國，遠遁異邦以求苟活之罪行，並非有意乞援而救宋。曾我部於此處論及宜中，尤爲荒謬附會，且適足見其對中國史了解的程度太低。

三〇八、二四於渝郊南泉中政校研究部。

德義日同盟陣線與中美英蘇聯合戰線的剖視

陳潮中

國際時局的變化，猶如走馬燈戲一樣，鬧來鬧去，花樣翻新，但是我們揭開來看，仍然是那兩套舊的把戲，實在沒有真實的新奇的玩意。國際上各種

性質不同的結合，都是以國家利害相同爲原則，無論公開的結成同盟也好，無論秘密的組成聯盟也好，其實都不能脫離其國家本身利害的立場。不過